

平准學刊

第三期 上冊

中國書畫出版社

平准学刊

第三辑

上册

平准学刊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商业出版社

平准学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论集
第三辑
上 册
平准学刊编辑委员会编

*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市顺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13.375印张 348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统一书号：4237·125 定价：2.95元

《平准学刊》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段云 傅衣凌 吴承明 陶大镛

主编：宁可 陈大鵠

执行编委：吴慧

编委：方行 从翰香(女) 宁可 刘永成

吴步初 吴慧 李祖德 李桂海

李根蟠 宋元强 陈大鵠 陈文华

陈支平 陈瑞德 郭松义 蒋福亚

穆祥桐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平淮学刊四辑上册

要目预告

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问题	田昌五
江南地区的开发及其在全国经济地位的变化	魏嵩山
秦汉移民实边政策检论	蒋非非
两宋东南围湖——一个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	闵宗殿
明清山林苗木经营初探	陈柯云
明清市镇性质之我见	樊树志
关于清代前期市民斗争的几个问题	罗崇良
析封建政府的薄赋敛	王者
生产力研究	
先秦的采矿与冶金	雷从云
消费研究	
隋唐时期的衣冠服饰	朱睿根
计量研究	
明清时代关中地区人口的消长	田培栋
《九章算术》中的“粟米之法”	宋杰
经济史比较研究	
从中外对比角度看近代中国人口的社会经济影响	陈其广
原始经济 半坡遗址农业生产力水平分析	叶茂
民族经济 少数民族与古代的家长奴隶制	张雪慧
地区经济 唐代渤海的社会经济	魏国忠 朱国华
城市经济 历史地理变迁与扬州城市兴盛的关系	杜瑜
经济思想史文稿	
荀子的消费观	王义治
《通典》《通志》《通考》中的人口思想	王守稼 缪林鹏
人物传论 裕谦	策·巴雅斯古冷
考察报告 从历史上的宁波看宁波港的未来	余棣

目 录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	宁可	(1)
历史时期河套地区农业开发与沙漠化的关系	包忠谋 张波	(25)
秦汉时期的罪犯劳动	宋杰	(37)
宇文融括户	阎守诚	(65)
唐后期屯田的变质与败坏	张泽咸	(83)
朱元璋的整肃吏治和严惩贪污	韦庆远	(103)
明清滥伐森林对生态的破坏	暴鸿昌 景戎华	(143)
明清漕运沿革与清代前中期漕运弊端	王永谦	(157)
封建末期人口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王文治	(173)
· 生产力研究 ·		
宋代的复种制	王曾瑜	(199)
水转大纺车及其历史命运——兼论明清中国何以未能发生工业革命	李伯重	(209)
· 计量研究 ·		
宋代解盐利润率考析	郭正忠	(245)
清代的亩制和流行于民间的田土计量法	郭松义	(263)
· 地区经济 ·		
明清珠江三角洲的高利贷	叶显恩 谭棣华	(281)
· 民族经济 ·		
明清海南岛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张雪慧	(303)
· 原始经济 ·		
半坡遗址居民的农耕方式	宋兆麟	(319)
· 经济史比较研究 ·		
传统农业阶段中西农书比较研究	董恺忱	(333)

•制度考索•

秦汉上计制度述略 高 敏 (345)

•古代经济管理思想•

西汉时期“以轻重御民”的国民经济管理

思想与实践 郑学益 (367)

•学术通信•

对“火耕水耨”的再认识 李根蟠 (405)

•读书札记•

明代广州市舶司迁移问题质疑 陈尚胜 (415)

“茶为累也”释、“精行俭德”析 范孙操 (279)(404)

《潜夫论》的著作年代及王符的生卒年推测

..... 叶世昌 (399)

•文史杂识•

李自成的“永昌通宝”、清代佛山的“花盆

行历例工价列”。清中叶的一台蜀锦机、描

绘清初运送军粮的《北征督运图》

..... 刘如仲(64)(197)(243) (301)

铁铺、古代越族的织锦机 小 达(208)(241)

《南都繁会图卷》反映的明后期海外贸易。

《职责图》中记载的清代各族的生汗及贡赋

..... 汪 琦 (261)(414)

清代同仁堂药店的药模、云南布政使司颁发

的开荒执照 王 芳 (318)(331)

出土文物反映的滇人经济 石 墉 (362)

•名物考辨

从应县木塔藏经看辽时燕京的雕板印刷业

..... 郑恩淮 (417)

•简讯• 《南方草木状》真伪问题的讨论 朱洪涛 (140)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

宁 可

地理环境及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地理环境，或者说，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自然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必要条件之一。它包括在历史上形成的与人类社会活动相互起作用的那些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矿藏、植物、动物等等，而为上述诸方面及其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复杂的综合体。自有人类以来，地理环境因自然本身的发展而引起的变化一般来说是缓慢的、不大的。而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却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与加深^①。地理环境既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舞台，又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重要对象。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恩格斯写爱尔兰史，第一部分就是爱尔兰的自然条件^③；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也是从中国的地理环境开始的。

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生产、生产方式，而作为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的生产力则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力的物的因素中，劳动对象包括没有经过劳动加工的自然物，以及经过劳动加工的原材料；而劳动资料中的生产工具，是经过劳动加工的自然物，此外还有在劳动过程中所必需的其他物质条件，如土地、生产建筑物、道路、河流等。可见，生产资料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都是自然物或经过劳动加工的自然物。因此，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中参

与生产过程或作为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那一部分、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因素而包括在生产力这一范畴之内的。在此之外的那些自然条件，有的或者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因素（如尚未开垦的荒地，尚未开发的矿藏等），或者通过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影响而间接作用于生产力（如气候影响农作物的品种和生长，影响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地形影响交通运输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④此外，除了经过生产力起作用外，地理环境也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其它社会因素如民族、语言等起着某些直接的作用。作为我国核心地区的东部地区地形平缓、交通便利，不能不说是中国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形成的一个有利条件，而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则大大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

与人类社会活动交互起作用的地理环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第一，地理环境因自然本身的发展而引起的变化虽然一般说来是缓慢的、不大的，但终究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我国五千年来气候的变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其一系列后果就是人们熟知的例子⑤。至于局部地区、短暂时期内的地理环境的剧烈变化如地震、火山喷发、雪崩、泥石流、海啸、大水、大旱等，往往对该地区人类活动产生重大的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第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活动交互起作用的地理环境不断扩大，如今已伸展到了外层空间、洋底和地层深处。第三，自人类摆脱了动物状态，也就是说，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以后，人类就通过劳动，从单纯依赖于自然界、利用现成的自然条件，逐渐走上了改造与支配自然界，以为自己所用的道路。随着人类的发展，这种改造的规模日益扩大，程度日益加深，以至今天的自然界遍布着人工驯化的动物和栽培的植物、巨大的堤坝、繁荣的城市、改造的河流等等人类劳动的印记，和远古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而这种改变了的自然界又给人类的历史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问题，如能源、污染、生态平衡等等。第四，在

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样的自然条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起着完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作用。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洋曾经隔绝了人们的交往，但是当帆船、轮船相继出现以后，它就成了人类最重要的交往途径之一。多少年来，外层空间与人类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几乎毫不相关。而今天由于火箭及人造卫星的发明，它已经深深地进入了人类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领域、大国争霸的场所。总之，地理环境的范围、深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不相同。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自然本身的发展，更主要地是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社会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类改变、利用和控制地理环境的能力。因此，我们说地理环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也正因为如此，地理环境虽然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但它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诸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参与劳动过程或成为劳动过程的必要条件的那些自然条件，而是创造和使用工具改变自然条件使之适合人们需要的劳动者，因此，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发展的论点是错误的。地形平缓，交通便利固然是中国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形成的一个有利条件，但类似的地形却并没有使中世纪的西欧形成统一集权的国家。仅靠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事实上，它也没有产生过其他的荷马。历史上不少学者，从古希腊的希波革拉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国的司马迁到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和英国社会学家巴克尔、俄国地理学派的代表梅尼奇科夫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可以用整个地理环境或其中的某些因素（气候、地理位置等）的决定性作用来加以说明，他们的论述中不乏精辟的观点，而且具有一定唯物主义的色彩和历史进步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普列汉诺夫虽然反复论证了决定社会性质和发展的是生产、生产

力，却又在不少著作中认为决定生产力的是自然环境⑥，仍然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一直到现代，美国马翰的“海权论。”欧洲地缘政治学派的“生存空间论”和“大陆中心说”乃至美国史学家中的“新边疆学派”等，仍在借着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霸权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制造理论根据。

然而，否定或忽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同样是不对的。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尽管对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作了正确的阐述，但他讲生产力时却又把劳动对象排除在生产力诸要素之外，实际上还是忽视了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对生产发展的重要作用。

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它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促使（但不是决定）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不平衡性。越是人类发展的早期，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越弱，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界的依赖就越大。但这不等于说，自然条件最有利的地区，即人们花费最少劳动就能取得丰富生活资料的地区社会发展速度最快，因为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往往使人们过分依赖自然界，不易促使他们去发展生产工具和技术，也不易促使他们去发展社会分工。“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⑦人类的历史发展证明，对古代社会发展最有利的是富有差异性和自然产品多样性的地理环境，这样的地区，多在温带，中国也包括在内。

第二，促使（但不是决定）主要条件相同的经济基础呈现出差异性。“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说来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

别。”⑧不同的地理环境使得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社会呈现了不同的发展水平、类型和特点。同是奴隶制社会，古代希腊、罗马的商业较中国发达，除了各自的社会特点外，希腊、罗马濒临地中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时，应当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特别是要注意人们为生产活动给地理环境带来的变化及其所造成的经济的、社会的后果。

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要重视地理环境给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带来的特点以及与其它国家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也要重视古代中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由于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东亚大陆”及其内部的历史地理区域

我国各族人民的祖先劳动、生息、繁育的亚洲东部广袤土地，在历史上自成一个单位，可以称之为“东亚大陆”。

“东亚大陆”大致呈一个自西向东倾斜的大三角形。它以帕米尔高原为顶点，以向东北和东南延伸的两组山脉带为两边。向东北伸展的一组包括天山、阿尔泰山、萨彦岭，外兴安岭山脉一直到鄂霍次克海；向东南伸展的一组包括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一直到南海岸。这个大三角形的底边则是太平洋岸。

“东亚大陆”外侧东北与北面是西伯利亚山地与平原，西侧是哈萨克台地与上兰低地，西侧偏南是伊朗高原，南侧是印度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东面是一系列向太平洋凸出的岛弧，如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等，它们围绕“东亚大陆”海岸，形成许多边缘海，如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等。

这个地区和外界的交通，陆路通道主要有三条，即帕米尔一带的山口、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山口和阿尔泰山以北的通道，由此可以通向印度、中亚、中近东和欧洲。帕米尔和天山、阿尔泰山之间的山口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及印度的商路（即所谓“丝绸之路”）的孔道，而天山、阿尔泰山之间及阿尔泰山以北的通道则是本地区民族向西迁徙的主要道路。十七世纪以后，沙俄侵略者也正是循着这几条通道向我国进行侵略的。

海路主要有两条，一是经大陆东部港口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重要路线。一是经南海到南洋群岛、印度、阿拉伯、非洲和欧洲。宋以后，经过南海的海路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西北方向的陆路，它成了荷、葡、英、法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向我国侵略的主要路线。

这片大陆的内部，地形复杂，景观多样。平原、山地、高原、峡谷、丘陵、盆地、沙漠、湖泊、沼泽，应有尽有。海岸线长而曲折，岛屿罗布。河流多而且长，大部分东向流入太平洋，少数流入印度洋和北冰洋，西部和北部还有广大的内陆河流域。气候南北之间和东西之间差异很大，在南北方向上，从黑龙江流域的寒温带气候，经过冷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一直到南沙群岛的赤道带气候，呈层次排列；东西方向上，东部属东亚季风区，温暖湿润，西部属大陆性气候，干旱寒冷。复杂多样的地形、气候、土壤与水文使得植物和动物种类繁多，分布也带有很大的差异性。此外，地下资源也极丰富多样。“东亚大陆”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差异性，使得农业、牧业、渔业、狩猎、林业、工矿业等都能因地制宜地得到发展，纷然并存，竞相争胜。这就给我国各族人民祖先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交流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也带来了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

“东亚大陆”内部，从历史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地理区域，它们既是历史上的地理区域和经济区域，也是历史上的民族

区域和政治区域。

(一) 东部地区

这个地区北到长城燕山和辽河中下游，东、南濒海，包括沿海岛屿，西到贺兰山，经四川盆地西侧的山脉到云贵高原东部，西北部凸出，即河西走廊。在本区中，秦岭和淮河是划分南北的天然界线，南船北马，南米北麦，反映了界线两边地理环境不同带来的经济生活的差异性，秦岭淮河以北，太行山和嵩山、伏牛山，是西部的黄土高原与东部的海河、黄河、淮河冲积平原的界线，在古代历史上通称为关东、关西。秦岭淮河以南，南岭则是一条次要的分界线，群山环绕的四川盆地也带有某些独特的地理格局。

这个地区历史上活动的主要民族是汉族。

这个地区除河西走廊处于冷温带、南沙群岛处于赤道带外，均处于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在东亚季风区内，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很早就有了农业，是“东亚大陆”主要的农业区。因此，是“东亚大陆”人口最密集，进入文明时期最早、经济文化发展最迅速与最发达的地区。秦岭淮河以北地区，降雨集中在夏季，每年雨量也不稳定，时有干旱威胁；海河、黄河、淮河冲积平原地势低平，黄河从黄土高原突然降到平原地区，挟带的大量泥沙迅速沉积，水道宣泄不畅，遇有大雨易于发生洪水或内涝，黄河古代分支入海，有所谓九河之称，现在的河北、鲁西北平原，正好处于九河之间，当时是巨大的沼泽地带，今天的白洋淀、黑龙港地区，还保留着这个巨大沼泽地带的遗迹。秦岭淮河以南，主要种植需要人工灌溉的水稻，而且水稻的栽培逐渐向丘陵地带发展，形成有名的梯田，过去认为梯田始于北宋，现在看来可能早到东汉。因此，在东部地区，无论是秦岭淮河以北还是以南，防洪、排水、灌溉等水利事业成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过去不少论者认为水利灌溉事业是中国古代社会属于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论

断并不确切，因为在中国最早进入阶级社会的黄河中下游，农业最早兴起于河谷两侧的台地，多为旱作，大多无需也不可能灌溉，至多只需防洪。不能说水利特别是灌溉在当时是农业的命脉；这个地区的大规模灌溉事业的发展是在战国之后，而那时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已经一千多年了。

东部地区中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发展较早的还有长江中下游地带，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说明了长江下游进入农业社会可能比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还要早些而且更发达些。但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发展超过了长江中下游，最早进入了阶级社会。这可能是当时黄河流域气候较今温暖湿润，低温和干旱的威胁较轻，黄土高原与黄土冲积平原土质疏松，透水性好，旱作农业技术又较简单，花费劳动较少，开垦较易，使以木、石、蚌、骨为材料制成的工具及原始农业技术较易生产出剩余产品来，也使人口能较快增长，从而使奴隶劳动成为可能并得到发展。相形之下，长江流域过于炎热潮湿，不如黄河流域宜于居人，不少地区覆盖着大片的热带原始森林，平原地区则湖泊沼泽四布，榛莽丛生，加上土质紧密，种的又主要是水稻，平整土地和引水灌溉技术要求高，劳动量大，在原始的生产工具与技术条件下，大量开垦困难，即使有一些比较发达的地点，由于河湖沼泽丛林榛莽的阻隔，也不易扩大交往，连成大片，形成强大的力量，人口发展也因此受到限制。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进入阶级社会，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应当说不是偶然的。^⑩

中国的三个奴隶制王朝——夏、商、西周，即分别在黄河中下游的不同地段建国。夏的主要活动地区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中、北部，商是在山东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区加上河南东、中、北部，西周则是关中的渭水流域。至于河北，除在燕山、太行山麓的一条狭长地带外，由于黄河下游河道纵横、沼泽四布的地貌，直到北朝隋唐时才比较迅速地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黄河中下游在

夏、商、西周主要活动地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三个经济区，即关中地区、三河地区（河东、河南、河内，即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也就是战国时的三晋地区）、山东地区（齐、鲁，包括河北南部）。春秋战国时最早兴盛的是齐鲁，继之而起的是三晋，最后以关中为基地的秦统一了六国，以关中为中心，黄河中下游为主要基地，建立了第一个统一集权的封建帝国——秦汉帝国。关中地区当时虽然很富，但比较狭小，需靠关东广大地区的发达的经济的支持。漕运山东之粟以济关中成了西汉政权的一大问题。东汉建都洛阳，离山东（包括淮北）较近，水运较通畅，不需经过险隘的三门峡，也是原因之一。隋唐以前，以函谷关为界的关系东、关西地区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往往呈现了一些差别。隋唐以来，两地的差别大体泯没了。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楚、吴、越、巴、蜀的努力，长江流域逐渐开发，形成了三个经济区，即四川盆地、荆楚地区、下游三角洲（包括淮南）与钱塘江流域。四川盆地自成格局，战国秦汉时，它与关中的联系反而比荆楚及长江下游要密切一些，成了秦汉时关中的后院。岭南地区的开发在秦汉时也已开始。经过王莽末年的战乱，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荆、扬、交、益四州，西汉末年户口占全国户口总数不到五分之一，东汉时，已经上升到三分之一以上。这就是三国的吴蜀和东晋南朝立国的经济基础。东晋南朝时，长江流域的发展大大加速，并被认为是“衣冠礼乐尽在其间”，和中原在文化上的差别泯没了。而黄河流域则因战乱，农业生产及人口大大下降，北朝后期至隋唐虽然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但发展速度不及南方。唐中叶以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特别是长江下游的发展水平超过了黄河中下游，其范围也逐渐向南扩展，与较早开发的岭南连成这片。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经济发展超过黄河流域也不是偶然的。近二千年以来，我国气候的总趋势是逐渐变冷，长江流域及其以南

的气候条件变得更适宜于人类的居住和农业的开发。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原来开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困难逐渐得到克服，垦田面积增加了，一旦得到开发，这带地区在降水量、温度、总热量等方面的优势就充分显示出来了。这个地区主要种植高产粮食作物——水稻，特别是双季稻的普及，更使它在全国经济中占了优势。反之，黄河流域气候渐趋寒冷后，水体大为减少，气候干燥。黄土高原经过长期开发，天然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水利灌溉日益困难。人口的压力又加剧了滥垦乱伐，由此又引起了水旱灾害的增加。过度开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再加上北方地区是全国政治军事重心，阶级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比较激烈，战乱比南方多，而周边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如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南下，常在一段时期里给社会带来破坏，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上述种种因素使得黄河流域经济的发展从唐宋以后陷于停滞、缓慢的状态，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则取代了黄河流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并随之而成为全国的文化重心。

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原因，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仍在黄河流域。五代北宋以后，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为契丹、女真、蒙古等，一般来自北方偏东，因此政治军事中心也就从黄土高原上的关中地区或其东方门户洛阳东移，与江淮交通方便，又以黄河为屏障面对深入燕山以南的契丹的开封就成了五代北宋时合适的建都地点了。金、元、清三朝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坐北朝南，背靠自己兴业之地，南向统治汉族地区，北京成了理想的建都地点，明朝面对蒙古，也把都城从南京北迁。这样，北京代替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成为十二世纪以后中国的国都，历八百多年而未替。由于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联系南方主要经济区与北方政治军事中心的大运河，自隋唐以后具有了很大的历史重要性。元代以后，除运河外，南北方向的沿海航运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